

四封家书 展现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

□王 桢

百年征程波澜壮阔，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无数仁人志士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为一封封充满亲情、爱情和革命理想的家书。品读革命烈士的家书，是对初心的再一次重温、再一次叩问，有益于发扬红色传统、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。

杨开慧：一封未能寄出的信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修缮杨开慧家老宅时，工人们从泥缝缝和檐头里意外发现一沓手稿。经考证，这些都是杨开慧在同毛泽东分别后的日子里写就的，因环境险恶无法寄送，只能将信件分藏家中。沉寂半个世纪的手稿内容情真意切，充满对丈夫浓浓的思念和坚定的革命情怀，令读者无不动容。

1927年8月，因革命斗争的需要，毛泽东从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，妻子杨开慧则带着3个孩子回板仓老家继续地下斗争。不久，由于秘密交通遭到破坏，杨开慧只能通过报纸寻找丈夫的消息。每当看到国民党对“朱毛”屡“剿”屡败的新闻时，她既被革命鼓舞又为毛泽东担心。带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后，挂念杨开慧的毛泽东派人到长沙打听情况，结果得到了杨开慧“被害”的噩耗，这令他悲痛万分。事实上，杨开慧提前获得要逮捕她的消息，及时转移隐蔽。当地群众又有意传播杨开慧死讯，意图迷惑敌人。阴差阳错，远在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没有获得真实情况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杨开慧的处境愈发危险。1929年3月7日，《国民日报》刊登朱德妻子伍若兰被砍头示众的消息。杨开慧对此感到无比愤慨，同时也感到死亡如影随形。她得知堂弟杨开明从井冈山到达上海后，立即提笔给他写信。她在信中表现出一位革命者的勇敢：“说到死，本来，我并不惧怕，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。”杨开慧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，她请求堂弟和家人在自己遭遇不测后给予孩子关爱。对朝不保夕的日子，杨开慧做了最坏打算。她坦然地写道：“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，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，把我缠着，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！”信写好以后，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，杨开慧只好暂时将其藏匿在墙缝中。

事实上，毛泽东也始终惦念着杨开慧和孩子们。1929年初，毛泽东离开井冈山，转战赣南、闽西地区。在得知杨开慧还活着后，他于11月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，说“我时常念及他们”，并询问杨开慧的通信地址。但由于革命的颠沛流离和敌人的严密监视，他们还是没能取得直接联系。

失去联系的日子里，杨开慧强忍内心的苦楚，在照顾家人的同时，坚持做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。闲暇时，她用笔寄托自己的情感：“几天睡不着觉，无论如何，我简直要疯了。许多天没来信，天天等。”“谁把我的信带给你，把你的信带给我，谁就是我的恩人。”“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，一头是你，一头是小孩，谁都拿不开。”“我真爱你呀！天哪，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！”……与之之前的信一样，这些信也被尘封在泥砖之中，没有如愿寄出。

1930年10月，杨开慧在板仓家中不幸被捕。敌人妄图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名单和毛泽东的具体情况，并认为“杨开慧如能自首，

胜过千万人自首”，对她严刑拷打，百般利诱。但是，她大义凛然，始终坚强不屈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。1930年11月14日，杨开慧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，年仅29岁。

赵一曼：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

赵一曼，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赵一曼很快就被马列主义所吸引，她如饥似渴地阅读《向导》《新青年》《妇女周报》等革命书刊。虽然守旧的家人趁赵一曼不在屋时，将书刊付之一炬，但仍不能阻拦她接受革命新思想、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。1926年夏天，21岁的赵一曼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7年9月，赵一曼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在苏联，她和中共党员陈达邦结成革命伴侣。1928年，赵一曼回国，陆续在宜昌、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。此间，赵一曼生下一个男孩，取乳名“宁儿”。由于工作紧张，她将孩子寄养在汉口陈家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党中央派遣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，赵一曼也在其中。她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、组织部长，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、铁北区委书记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，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。在此期间，她用题为《滨江述怀》的诗，抒发自己的抗日理想：“未惜头颅新故国，甘将热血沃中华。白山黑水除敌寇，笑看旌旗红似花。”

1935年11月间，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的赵一曼，在掩护部队突围的过程中身负重伤。养伤时又被日军发现，经过殊死搏斗，不幸昏倒被俘。日军用针扎、烙铁等残忍手段对赵一曼施以酷刑，希望逼其招供。严刑拷打没有使赵一曼屈服，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，她严词痛斥了日军侵略罪行。由于赵一曼伤情严重，为套取情报的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。赵一曼在医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争取看护人员。1936年6月28日，她在医院看护帮助下逃出医院，但很快被迫再次被捕。

赵一曼受到的刑讯更加残酷，但她始终坚贞不屈。面对拥有钢铁意志的赵一曼，穷凶极恶的敌人没能得到任何秘密。1936年7月末，残忍的野兽发疯了，他们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“示众”。8月2日，在押送车上，自知死亡迫近的赵一曼没有惊慌失措，而是向敌人展现了“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”的革命气魄。在最后的的时间里，她从押送人员处要了纸笔，希望给远方的儿子留下道别的话。“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。”“宁儿啊！赶快成人，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！我最亲爱的孩子啊！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

临刑前，赵一曼高唱《红旗歌》，“高高举起呀！血红旗，誓不战败，终不放手”，“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告别

歌”！年仅31岁的赵一曼壮烈牺牲，她所写的革命家书，则在漂泊21年后，终于辗转转到“宁儿”手中。如英雄赵一曼所盼，家人聆听到了她最后的嘱托。

陈觉、赵云霄：两封诀别信

两封催人泪下的书信，安静地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柜内，其中一封是陈觉就义前给妻子赵云霄的诀别信，另一封是赵云霄给襁褓中女儿的遗书，书信文字感人肺腑、震撼人心。在生死考验面前，陈觉、赵云霄这对年轻的革命伉俪，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侠骨柔情。

1925年，22岁的陈觉和19岁的赵云霄作为第一批先进青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学习期间他们相识相知相爱，结为夫妻。在陈觉写的诀别信中，曾回忆这段青春难忘的岁月：“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，互相切磋，互相勉励，课余时间闲谈琐事，共话桑麻，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，或旅行或游历，形影相随。”

1927年，陈觉、赵云霄一起回国，先后在东北、湖南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。这年11月，回到家乡醴陵的陈觉、赵云霄，与县委一道领导武装建设，开展革命斗争。1928年春，中共湘东特委和醴陵县委发动“醴陵暴动”。作为省委特派员的陈觉，参与指挥了这场战斗。革命道路危险坎坷，夫妻二人始终相互扶持、鼓劲，共同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。陈觉在信中写道：“去年返国后，你路过家门而不入，与我一路南下，共同工作。你在事业上、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，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。”

此后，陈觉被派往常德组织湘西特委。赵云霄因有孕在身，回到省委机关负责联络工作。1928年4月，外出联络的赵云霄被叛徒发现，随后在住处被捕。面对敌人的盘问，赵云霄始终一言不答，守口如瓶。而远在常德县城的陈觉，由于叛徒告密被捕。长沙反动当局判定陈觉、赵云霄夫妇是“大有油水”的人物，开出“供出组织，立即释放”的劝降条件，陈觉夫妇对此嗤之以鼻。失去耐心的敌人随即对陈觉进行残忍的拷打，企图从肉体和心理上摧毁这对“笼中”夫妻。但结果仍是令他们失望的，陈觉、赵云霄的革命意志始终坚如磐石！

最终，一无所获的反动当局以“策划暴动，图谋不轨”的罪名，判处陈觉、赵云霄死刑。陈觉在就义前给妻子留下诀别书。“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，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。我们虽然是死了，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。”1928年10月14日，陈觉被害于岳麓山穿石坡。4个月后，赵云霄为刚刚出生的女儿取名“启明”，并留书一封，寄托自己对女儿的爱。“小宝宝，你是个不幸者，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，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。”“我很明白地告诉你，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。”“望你好好长大成人，且好好读书，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。可怜的小宝贝，我的小宝宝！”1929年3月26日，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口奶后，赵云霄毅然走上刑场，牺牲时年仅23岁。

（摘自2021年第4期《党建》）

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。腿部负伤的陈毅留在苏区，领导红24师及地方武装共1.6万余人坚持斗争。经过转战，于1935年3月到达赣粤边的油山地区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。红军游击队天当被、地当床，与敌人周旋，顽强战斗。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，陈毅创作出了许多文字冷峻、意境幽远、结构精当、寓意深刻的革命诗篇。

1935年冬，陈毅与游击队员在某天夜里，攀藤附葛，翻过险要崎岖的梅岭雄关。到达仙人岭时，陈毅感慨万千，写就七言绝句《偷渡梅关》：敌垒穿空雁阵开，连天衰草月迟来。攀藤附葛君须记，万载梅关著劫灰。首句描写森严敌情，次句刻画自然环境。深冬的夜晚，梅岭上敌军碉堡，如展开的雁阵一个挨一个，枪口黑洞洞密如针孔。枯萎的野草，茫然然伸向天际；而一钩冷月，缓缓地爬上星空。两句本是写景，展现梅关冬夜的凄冷景色，但加上“敌垒”二字，一下子就烘托出了紧张的战斗气氛，使得原本像剪影一样的寒夜山野，陡然间变得阴森恐怖。看似写景，实则烘托当时的紧张气氛。第三句点题，具体描写抓住藤蔓攀爬的动作。“君须记”是让同志们记住这条小路，以后还要回来。末句是诗眼，陈毅身处险境，仍坚信红军一定能冲破艰难险阻，夺取胜利。

就在这次行军途中，战士们累得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在仙人岭石堍里稍事休息。一觉醒来，生性乐观的陈毅风趣地说：瞧，我们头朝广东，脚向江西，一身压着两个省呀！说得大家都开口笑了起来。

1936年，夏季的油山，阳光充足，野果野菜遍野，敌人也暂时退去。陈毅一扫心中的阴霾，灵感喷涌，用白描的手法写实构思，遂完成《赣南游击词》，生动传神地勾勒出了红军游击队战斗、生活、行军中的许多典型场景，真实地记录下战士们的艰辛与喜悦。

他的诗词无拘无束，就像他说话，可以吼声如雷，谈到诙谐处，又会逗得人满堂开怀。

到了秋天，陈毅回忆起这几年一直在赣南五岭山脉一带率部作战，处处危机四伏，极其艰苦，8月26日正值自己35岁生日，故赋诗寄怀：大军西去气如虹，一局南天战又重。半壁河山沉血海，几多知己化沙虫。日搜夜剿人犹在，万死千伤鬼亦难。物到极时终必变，天翻地覆五洲红。首联写实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，已胜利站稳脚跟。留守的红军在南国一隅，又遭遇战事重开。一北一南的胜局与困境，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。颌联比拟，东北三省遭日寇铁蹄践踏，红色根据地也大片丢失。山河破碎，国难当头，多少战友血洒疆场，悲壮牺牲。颈联则由宏观到具体，视角像镜头一样拉近，从全国的局势转到赣南的油山，再转到艰难的游击战。国民党军欲置红军游击队于死地，步步为营、重重封锁、围追堵截，但陈毅率领游击队员，翻山越岭，昼伏夜出，打不垮、击不溃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。尾联借用“物极必变”“天翻地覆”，寓意革命必然成功。

陈毅创作的这首七言律诗，视野开阔，气势恢弘，结构严谨。纵使万死千伤，做鬼也是英雄。这种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精神，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，令人为之动容！

这年初冬，陈毅创作了七言绝句《雪中野营闻警》：风击悬冰碎万瓶，野营人对雪光横。遥闻敌寇吹寒角，持枪倚枕到天明。这首诗充满了边塞诗的味道。用比喻、拟人等修辞手法，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游击队员在冰雪峰岭

艰难岁月谱就英雄诗篇

□欧阳青

中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真实场景。上句突出写“冰”。岭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，一年四季很难见冰雪，但油山昼夜温差较大，山脚虽温暖如春，山顶却寒冷刺骨，树枝上悬挂的冰柱长短粗细不一，千姿百态。突然一阵寒风刮来，直击冰柱，冰柱又互相撞击，发出碎裂的脆响，纷纷掉落到地上。本来山岭一片寂静，但因有了“风击”，“碎万瓶”的响声犹如天籁，使冬日的山野充满了灵气。野营途中的游击队员，艰难跋涉，周遭雪野茫茫，只有一片片白皑皑的雪光扑入眼帘。下句突出写“险”。在油山寒冷险恶的自然环境中，游击队员本来就缺衣少药；而远处敌军堡垒里又传来军号声。游击队员一个个在树丛中，在藤蔓旁，和衣抱枪，半梦半醒，直至天明。

寒冬时节，国民党军又对梅岭进行“清剿”，陈毅等人被围困在山林草莽之中。敌人白天放警犬追踪，晚上用探明灯搜索，有时还放火烧山，加之陈毅腿部旧伤复发，行动不便，所以难以突围。在被围困长达20多天的时间里，陈毅苦苦思虑，恐难脱身，遂写下“绝笔诗”《梅岭三章》：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百战多。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。南国烽烟正十年，此头须向国门悬。后死诸君多努力，捷报飞来当纸钱。投身革命即为家，血雨腥风应有涯。取义成仁今日事，人间遍种自由花。

这首“绝笔诗”藏在衣内，充分表达了陈毅献身革命的决心和革命必胜的信念。就在这个生死关头，“西安事变”爆发，国民党内部慌乱，进山搜剿的国民党军悻悻离去，陈毅最终转危为安。

陈毅曾这样评述：这三年游击战争，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。可以说，他的这些咏怀言志的篇章是在九死一生的危急状态下磨砺而成，困境与希望并存，展示给人们一个积极乐观、气概豪迈的崇高形象。

（摘自2021年4月17日《解放军报》）

一把小军号 浓浓战友友情

□白 龙 李洪兴 王锦涛



红军会宁会师旧址

岁月无言，历史有证。走进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，一件件红色文物让人不禁发问：是什么让革命先辈在极其艰难的条件

下，依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？静静陈列在展柜一角的把小军号，见证了会宁县大墩梁阻击战的惨烈场景，也见证了一位红军老战士的革命情怀。它的主人，就是红四方面军5军39团司号员李克玉。纪念馆解说员杨婷说，会宁会师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将大会师后的红军一举歼灭，于是派出5个军分4路围堵红军主力。大墩梁阻击战就是双方在会宁地区进行的6次大的战斗中，最惨烈的一仗。

1936年10月23日，大墩梁战斗打响，年仅17岁的司号员李克玉吹响了冲锋号，红军将士们奋勇杀敌。战斗中，李克玉腿部受了重伤，不能随部队一起北上，就和其他战友一起留在当地养伤。军长董振堂安抚伤病员说：“伤好以后，我亲自来接你们归队。”

养伤期间，李克玉整日都把小军号带在身边。伤好以后，李克玉又每天抱着这把小军号站在大墩梁山头上，凝望着北方的天空，盼望战友们出现。然而，他不曾想到，董军长和很多西路军将士已长眠在了河西走廊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李克玉当上了生产队队长，他的小军号成了村民上工的工号。1986年，会宁会师50周年时，年近古稀的李克玉带着心爱的小军号再次登上大墩梁，和70多位老战友故地重游，紧紧相拥。战友友谊穿越几十年的时光，见证着当年的峥嵘岁月。

（摘自2021年2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拴马石柱见证光荣

□白 龙 王锦涛 李洪兴

在甘肃会宁，至今还保留着一根1米多高的四方石柱。这根不起眼的石柱，当年曾经控过朱德的坐骑。

“1936年10月9日下午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率部到达会宁。”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俊丰介绍，朱总司令沿南川大道进入会宁城区，穿过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搭起的彩门，看着兴高采烈的战士们，朱总司令激动不已。

在县城东北角，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一户居民的院子里，院子的主人姓邢。这家院子大门朝西，前面不远处是焦家坑，坑内有作过油房的窑洞。为了防止敌人空袭，当年红军的电台就设在窑洞里。大门前有两根一米多高的四方石柱，其中一根就被用来为朱总司令拴马。

“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我家的老宅里”，邢家后人邢永强说。时光荏苒，那根拴马柱保留了下来。2015年，邢永强凭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，用多年积蓄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一座红色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着朱

德用过的床、桌椅等藏品，向社会免费开放。

1936年10月20日，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、红军大学部分学生以及第4军、第31军从县城北门出发，浩浩荡荡向北进发。前来送行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两旁，依依不舍地向红军挥手致意。朱德握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和群众代表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，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，谢谢父老乡亲！红军已把火种播在了这里，你们要让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，烧毁旧世界，建设我们自己的新天地。”

直到这时，当地群众才知道，这位穿着朴素、身材魁梧、慈祥可亲，有空就为房东挑水抱柴的汉子，原来就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红军总司令。人们纷纷走上前来，抢着和朱总司令握手。受红军精神激励，当地一批热血青年光荣参加红军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（摘自2021年2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